

# 公众认可可是办好音乐节的基石

◆ 韩斌



《窈窕淑女》剧照 郭新洋摄

音乐节这个词来得晚,可是,得名晚不等于历史短,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就有“音乐节”名头的节庆表演,热闹非凡。古希腊城邦文化中那种追求人生享受与生活乐趣的观念,成为了孕育艺术节的摇篮。

近现代意义上的音乐节,最早大致可以追溯到1715年诞生的英国三城音乐节,即格洛斯特、赫里福德与伍斯特三个城市在每年夏天轮流举办的音乐节。三个城市的合唱团轮流互访,通过音乐会来切磋交流合唱技艺。到20世纪又诞生了像萨尔茨堡音乐节、琉森国际音乐节、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等著名的音乐节。

1970年代末,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原来欧洲中心的音乐节格局悄然发生变革,大洋洲、美洲、亚洲的音乐节异军突起,而音乐节也有了向综合性艺术节发展的趋势。例如1947年二战之后创建起来的爱丁堡艺术节使人口才40多万的城市,能够在艺术节期间吸引数百万人,同时拉动了当地的旅游、餐饮、娱乐,产生了良好的循环效应。仅2010年爱丁堡艺术节就为苏格兰带来了2.61亿英镑的额外旅游收入。

“上海之春”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举办最早、最具影响力的音乐节,从1959年的“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到1960年第一届“上海之春”,再到2001年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风雨兼程五十七载。至今,“上海之春”始

终秉持“繁荣创作、提携新人、活跃与提高群文活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上海之春”如果更包容、多元、兼容并蓄,这就需要在体制机制上突破、在理念手段上创新,舍弃一些条块系统的拼贴,更多一些顶层设计的前瞻。比如,具有一定受众群体的电子音乐创作与演出,上海音乐学院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国际电子音乐周”,已经是较为成熟的项目,也积累了稳定的观众,是否可以从每年十月调整到与“上海之春”同步,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求得效果的最大化。可以借鉴近年来“上海之春”采取的“节中节”模式,使“上海之春”成为一个多元发展的音乐舞蹈、电子音乐、多媒体与视觉艺术等融合的更具现代感的音乐节。

对于一个音乐节来说,公众的参与度和认同感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而提高公众参与度除了宣传、演出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比赛。1963年的第四届“上海之春”上,举办了二胡、小提琴比赛,5月7日至5月13日举行二胡独奏比赛,共计两轮六场,我们现在都熟知的闵惠芬、蒋巽凤、王国潼、萧白镛、黄海怀等都参加了比赛,获得一等奖的是闵惠芬、蒋巽凤。同时开展的还有小提琴比赛,也是两轮六场,盛中华、李自立、郑石生、陈慧尔等都参加,郑石生获得一等奖。可惜的是,这一赛事没有再延续下去,试想,紧张、刺激且具有很强观赏性的音乐比赛,是多么能够吸引公众的关注,并且在在一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又会引起多么持久的影响,获奖者

也能脱颖而出。与“上海之春”同类的老字号音乐节“布拉格之春”,每年都会举办“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比赛,2016年的比赛就是钢琴和小号,都是两轮再加两场获奖者音乐会,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也会吸引观众不断关注比赛和音乐节活动。再比如萨尔茨堡音乐节,十分重视歌剧,多年来一直有一个与大师班结合的“青年歌唱家计划”,以2016年为例,从7月23日至8月25日一个月时间内,经过遴选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歌唱家们将跟随克里斯塔·路德维希等大师学习(并在萨尔茨堡大学举办四堂对公众开放的公开课),最终排演一部亨利·普塞尔的名作《仙后》作为汇报演出,将音乐高校内常见的声乐大师班推向公众,引起关注。这些都是行之有效且证明十分成功的可资借鉴的案例,应当适时打响“上海之春国际音乐比赛”品牌。

近年来,“上海之春”的音乐评论工作得到重视,从1960年只有三篇评论到2009年时的29篇,有了长足的进步。众所周知,“繁荣创作”一直是“上海之春”的宗旨,在新人新作的推出方面,“上海之春”也是不遗余力,大家都知道的《梁祝》、《红旗颂》都曾登上“上海之春”舞台,马友道、杨立青、刘敦南、赵晓生等作曲家也曾在这个舞台上活跃。但是,创作、首演之后,如果没有评论,就不会有更好的推广,许多作品就只能是昙花一现。对于新作的评论是专业性很强研究工作,要让世界知道中国新音乐的创作水准,除了海外演出,还有录音、乐谱出版,但更直接的方式是研究与评论。

唯有诚意创新才会有真正的发展,相信已近花甲的“上海之春”,老树新枝,定有一番春色惹人惊艳。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术时评」

## 生存、生活与生命 话剧《长生》的人生刻度

◆ 戴钟伟

人类对于“生”的三个阶段性追求:生存、生活与生命——从打拼生存资本到品尝生活滋味,最后到追求生命真义。原创话剧《长生》,对于“生”的阶段性体悟与剧作形成了奇妙的共振,荡起思维的涟漪。

毋庸置疑,编剧朱宜能够在21岁的年龄里写下这样一个故事,对生命的洞察和感悟是相当细腻而敏锐的。她思考的是每一个经历社会化成长过程的人,面对自我追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矛盾的迟疑、惊讶、恐惧以及左顾右盼。一个人在经历完各种社会化塑造的结果不是永生,而是不可回避的衰老;一个人在完成人生角色扮演后的结果不是圆满,而是更加悠长的困惑。

剧名感慨《长生》,实则质疑不老。事实上,在古今中外的各种剧目里,对于生命之花随着时间流逝终将枯萎的叹惋并不鲜见,但是很少见到如剧中这样毫不掩饰地大篇幅、全方位表达对衰老的无助、恐惧甚至“厌弃”的。

作为原创话剧作品,《长生》的价值高光点还不不仅仅是对人的生命保质期的思辨,剧作中对于默林的身份界定,以及家庭成员组成的设置,其实也是相当有意味的构成。主人公默林,上门女婿沈志军、女儿默燕妮、外孙女默飞,分别代表着三代知识分子的不同层面:从旗手到追随者、维护者,最后到叛逆者。剧中的两股对冲力量,一是老年默林对自己的深度怀疑,一是少年默飞对父辈的犀利批判,而中年夹在两股

力量之中,摇摆不定。三代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和价值取向的变迁,从某种程度上或许折射出剧作者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和价值坐标。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面对经济英雄占据话语权的现实,在哀叹知识分子贬值,人文体系崩溃,神殿蒙尘的时候,也确实需要有人客观诚恳地反躬自省,所谓的贬值、崩溃、蒙尘的背后,除了外界环境影响,自身的系统更新、价值重塑、人文关怀是否也出了大问题?剧中的尾声,安排了默林老先生捐献遗体的情节,在我的理解中,这大概就是剧作者对于知识分子希望打破自我,完成价值重建的一种隐喻。

因为对《长生》的命题有着很高的期望,所以在观演体验中还是有一些不满足。天才敏感驱使下的主题先行的剧作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在《长生》里都非常明显。在这种人文思辨色彩突出的剧作里,经常出现一种状况:肉体跟不上灵魂的脚步——剧情不能充分地支撑思想。相对于主题的突破性和敏感度,目前的故事本身具备的戏剧冲突和终极悬念稍显不足。所谓的戏剧冲突,不是庸俗的人物关系纠葛和夸张事件堆砌,而是基于人物性格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我始终认为,戏剧性是戏剧揭示人生真相富有的勘探钻头,是演出者及观演者之间世界相互影响的杠杆。所谓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类似于《长生》这种生活流、自然流的戏剧,戏剧性应该更多

建立在人物性格命运之上,情节如涓涓细流,汇成大海,而不是依托于跳出人物核心性格命运的外界触媒,或者活报剧式的强力推进。

虽然在剧作本身,作者已经很用心地铺陈了一代宗师光环背后的很具体很凡俗的喜怒哀乐,大师夫妻之间的拌嘴主题也和小人物一样,都是当年的“花花事儿”,大师也要为了外孙女的学业环境,对中学校长和班主任曲意逢迎。这种人物形象的反差很具烟火气息,也确实激起剧场内一次次会心的笑声,但从整体来看,默林的人生轨迹呈现略显沉闷,作为配角的家人性格塑造完全服务于主角的情绪对应需要,过于扁平化、概念化,没有为剧情演绎和主题推进提供足够的张力。

在戏剧中,写好反面角色才能让正面角色更具力量,写好配角才能让主要人物大放异彩。我其实一直期待着《长生》最后能够给我一个出乎意料的戏剧性反转,无论是默林还是他的家庭成员。但是最终还是未能如愿,剧中的几次情绪起伏较大的段落,看得见编剧写法上的合理性,但从人物性格发展本身却留有疑问。剧中以默林在生日当天住院抢救为人物性格命运的最后解决方案,终究还是显得过于合理也过于平淡了一些。而默林最后一句台词:“我想吃新奇士橙。”虽然呼应了之前剧情台词的铺垫,但力量感却远远不够点题全剧,仅仅只是博个有心人的会心一笑而过,很可惜。



更牵挂些。该片有几个小小的灾难,第一是主创人缘太好,朋友纷纷客串,陆毅、祖峰就设置得如同“撞衫”。人家《桃姐》客串也多,但摆放着错落妥帖。第二是投资略大,害得剧组跑好多地方;第三是编导太有才华,台词舍不得删减。

《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简称《北西2》)首日票房这么好,我一点不担心了,可以说说一直憋着的看法了。

这是个处处闪耀着深情也处处闪烁着遗憾的电影,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部半吊子作品。其中的爱情我无法代人,我觉得这像是来自无印良品的爱情。而无印良品,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冷淡俱乐部的代称。

情书不二,二的是拿情书来维系整部作品。这当然是编导的自信,自信能用那些娓娓话语撬动地球。男女主人公始终背对背,这样的电影要求极高精度,如《玛丽和马克思》。如做不到,索性如第一部那般,《甜蜜蜜》那般,始终相处相触却不承认是爱,那还让我们观众

## 拿情书维系整个作品 情书不二,二的是

◆ 史航

里掉书袋,但《北西2》不免掉得踉跄了些。可以称范仲淹为范文正公,但那是死后朝廷的谥号,不是生前自取的别号。老先生给孙儿写信,若说“经年”我懂,结果说“满载”,我蒙圈了。文青范儿让本片从澳门赌场起范儿,落点是《查令街84号》。强扭的情怀,往往得罪两边观众,慎之。

不过《北西2》也有很多亮点,而王志文饰演的赌场老毒物还是俊逸又阴鸷。他看着汤唯的眼神,让我想着他俩来一版《色戒》,一定是耐看又耐听。